

走进大家书房，  
遇见辽阔世界。

阅读史

敝书房名“两由之斋”，取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之义。址在上海虹口北外滩“名江七星城”。书房一主一副，总面积40余平方米，藏书约5000册，不求丰贍，但求实用。需时仍不断购入，体量不断膨胀。但空间有限，也不得不时有割舍。



王锡荣，1953年生。复旦大学文学硕士。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，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等职。著有《鲁迅生平疑案》《周作人生平疑案》《画者鲁迅》《藏家鲁迅》《左联》与《左翼文学运动》《日记的鲁迅》等。

## 读书滋味长

□王锡荣

我家不是什么书香之家，父亲只读了三年书，母亲是上世纪50年代在扫盲识字，家里藏书是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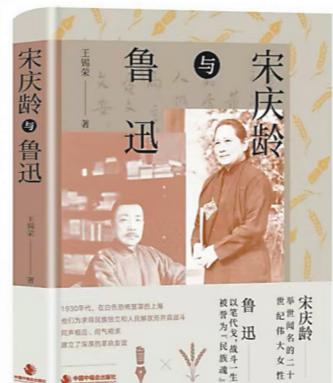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在60年代初开始上学，三年级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新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是南洋归侨，他热爱骂学生是知识上的“穷光蛋”。不知怎么一来，班上就掀起了读长篇小说的风，跟着我也陆续读了“三花”“三红”，然后是“水浒”“三国”，对《红楼梦》则不感兴趣，到多年后才得读。因为偶然的契机，初读了鲁迅，可是实在还不太能读懂。

“文革”来临，停课了，我到乡下陪伴我生病的外祖母。那时候，无意中从橱顶发现了大哥的一大叠中学课本和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成了我的宝物，每天读得入迷，那本《新华字典》都翻烂了。后来进了中学，遇到一群喜欢读书的“小老夫子”，从他们那里借到一套《历代文选》上下册，因为爱不释手，竟然想出一个绝招：用仿宋体把整套书抄到练习簿上，既练了字，也读了内容。后来订成两本，但是几次搬家后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还记得其中第一篇就是《郑伯克段于鄢》，最后一篇是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，这书是我最初国学基础，后来还啃了一半黑格尔的《辩证法全集》，根本就一头雾水。中学毕业进了工厂，硬啃过一段《资本论》。倒是对鲁迅发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星期天经常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读《鲁迅全集》，还到刚开张的上海旧书店买了不少线装本古籍。1977年《辞海》修订版出版，售价50元，我第一时间砸下自己的全部积蓄，买下这套书。

1976年10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在复旦大学的鲁迅著作注释组，这个组承担国家重大出版项目《鲁迅全集》中《日记(1927-1936)》的注释工作。1977-1978年，我们调访了与鲁迅有接触的前辈200多人，并编写注文初稿。我住在办公室里，白天工作，每天晚上就是我的读书时间，因此成了复旦图书馆教师阅览室和中文系资料室的常客，有时连周日也不回家，甚至除夕也泡在图书馆里。那几年有机会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，构成了我的基本文学素养。

1980年初我被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注释定稿，用了整整半年时间，每天到鲁迅博物馆，把鲁迅的14000余册藏书全部翻检了一遍，大开眼界。1981年底回到上海进入鲁迅纪念馆，次年才在就读华东师大夜大中文系；1987年毕业后，1991年考上了复旦的全职研究生。在读期间，有一门给我教益最大的课程，就是《形式逻辑》，它改变了我的思维方法。后来我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上做出了些许成绩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门课带给我的思考方法。

当代社会信息爆炸，文化快餐化，学校甚至培养学生练习速读，我却越来越主张细读文本，而不是追求速度。因为我发现，过去很多书，人们只注意到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，却没注意细读其字里行间透露的更多信息，遗漏了很多重要信息，导致理解的肤浅。我想，或许对快餐文化是应该略读，而对经典还是应该细读吧。



[书径]

或能有所发现。  
“布衣暖，菜根香，读书滋味长。”

[近读]

阎晶明：《同怀：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》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陈彩琴等：《红流

巨浪：上海左翼文化运动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
张全之：《春温笔端—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》，济南出版社

丁言昭：《萧红纪念卡》，团结出版社  
上海鲁迅纪念馆：《鲁迅上海生活志》，上海

辞书出版社

[自荐]

《宋庆龄与鲁迅》，中  
国中福会出版社 2024年  
12月

这本书从约稿到成  
书历经十年，友人笑称  
“十年磨一剑”，我则答  
曰：“其中九年都在找磨  
刀石。”

从化荔枝角万记

□杨子明



流涕，大有“荆山哭玉”之态。经过多年申诉、正名、推介，鸭头绿如今方得以正名，并得到公认。“水厅人就像当年打败日本鬼子一样开心！”此话为水厅黄姓村民所言。说是当年抗战期间，日军占领区神岗，就在水厅以南数公里。日军经常四处扫荡，白田岗一带村民深受其苦。

抗战胜利后，广东人在广州举办首次荔枝展览时，鸭头绿亦代表从化“进军省城”。因担心交通不便导致运输时间过长，番禺名人伍观淇曾派出自己的专车帮从化人运荔枝，一次运了两百斤，确实比人担牛驮便捷太多。水厅人吸取上次教训，以其量多，先请宾客尝鲜，争取群众基础。果然，评判员以貌取人，认为鸭头绿个头偏小、色泽偏暗，状若病态，初评即入“低品”。从化人不服，这回不用“水厅哭玉”，因为伍观淇在场——伍观淇在抗战期间曾是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，坊间称“广东挺进司令”，与日军于番禺、增城、从化、花县、三水、清远等地进行多年游击战，战功赫赫——他正不停地吃荔枝，而且像偏食一样，只吃鸭头绿，一直吃到评委从惊讶到转变立场。

如果当年有直播，此君才是真吃货！难怪村民说：“伍观淇帮从化帮到出晒面（意即毫不遮掩）！”众评判例行走完“反复对比”的品评程序，终评结果出炉，桂冠荣耀理所当然就是：水厅桂味兮，鸭头绿！

蝉鸣荔熟，广东从化，荔枝林间人来人往，农家推出入园尝荔，现摘现吃。走进集市，也几乎清一色荔枝，大喇叭播放着红线女的《荔枝颂》助兴。

虽说“荔枝一出百果贱”，但每年这个时候，各地不同品种荔枝齐齐上场，仍会显得“舞台拥挤”。果王之争，是内部竞争，正应了如今所谓的“内卷”。有人卖得高价，有人卖不出价；有人脱销，有人滞销。果多的靠市场流转，果少的靠零星售卖，各显神通。

荔农要做好销售，宣传推广从来不可少。清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，县令郭遇熙为接待贵宾，自费修建了一个荔枝园。这位贵宾即进士毛际可，这个荔枝园就叫“观澜亭”，位于今日围星村一带。园里的荔枝都是附近

农民种的老树。当时毛际可品尝后，为从化留下一篇传世文章——《观澜亭荔枝记》，为从化荔枝作了三百多年的历史。

从化水厅桂味荔枝远近闻名。水厅，位于城区南5公里一个叫白田岗的地方，地处锦三、南方、新明三村交会处，环水而建。此处所栽荔枝，即水厅桂味，老树皆为黄姓族人所有。因果的皮色跟鸭头浅花绿的毛色相似，起俗名“鸭头绿”。果品优质，独秀一方。村民尤自夸其核小优

势：“水厅鸭头绿桂味，也谁唔能食

满一茶杯核。”此话成了村民口头语。

若换成文人骚客，则曰：“水厅桂味兮，鸭头绿。饱食吐核兮，不盈杯！”因为果核小如米，数百粒核累不滿杯，云云。

从化地处丘陵，难得大片平地，

## 荔枝树下念亲恩

□李晓明

下几颗野果给我。“慢慢吃，小心有核。”他声音低沉却全都是宠爱，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满是温柔。

那时的山岭总浮着青雾。外公的竹笠在晨露里洇出了深色的水痕，牛铃铛撞碎林间的寂静。我常攥着他的衣角踩过湿润的苔径，看他用柴刀劈开横斜的枝权。在山稔熟透的五月，他的蓝布口袋总像变戏法似的，能掏出熟得发黑的大稔子果，衣襟上还沾着山苍子的辛香。

外公家庭院里有棵老荔枝树，蝉鸣最盛的午后，外公喜欢坐在树荫里织粪箕。篾片在他指间游走如银鱼。那时候，我总疑心那双粗糙的手怎会这般灵巧？树影下，就像人一样，得先把脚踩实。后来，我在外地上学时，家

的黑布衫上沾满红泥，可他说话的样子，总像山岩般沉稳。挖坑、埋苗、浇水，每一步他都认真得如同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。我站在一旁，好奇地盯着他看。一种好果苗，外公摸着他的头说：“等这些树长大了，结了果，咱们就有荔枝吃啦。”说着，他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。我更是眼睛发亮，满心期待地看着那小小的树苗在风中轻轻摇曳。命运无常，后来外公因为一次意外从高处摔下，导致头部受伤。受伤引起的并发症让他原本硬朗的身体迅速消瘦，往昔的严肃被病痛带来的无奈取代。那时，我还不懂生离死别的沉重，只看到外公越来越虚弱，越来越沉默。后来，我在外地上学时，家

突然传来了噩耗——外公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像是被抽走了魂，无力又无助。那个夜晚，晚自习后，我跑到学校仅有的那棵荔枝树下，静静地发呆了，想着那些与外公过往相对的画面，我潸然泪下。我朝着家的方向跪拜了三下，泪水连同对外公的思念，一同融入了荔枝树下的土地里。

今年，老家庭院里这株老荔枝树像是攒足了劲，突然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花。我走到树下，静静地伸手触摸着那些柔软的花朵……亲爱的外公，您是否也看到了这满树繁花？这棵树依然活得坚强而繁盛，我看着它就像看到您一般。这盛开的荔枝花，是您捎来的思念吗？

札记 □李文畅

即使是在他看来奉行以天道为核心的宇宙观、缺乏“理性”元素的明代中国内部，在葡萄牙人到来以前，便已出现了主张“发明本心”和“致良知”的儒家新流派

## 1517：全球视野下的“奇迹之年”

创”，而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频繁互动的结果。

理性价值的提升，还受到了地缘政治博弈的驱动。出于对抗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战略需要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曾派出使节，寻求与东欧王权力量联合的可能。这种外交上的尝试虽然未能达到直接目的，但却让俄罗斯这一“陌生的午夜之地”不再神秘。西欧逐渐意识到，刚刚摆脱蒙古帝国统治的莫斯科公国并非尚未文明开化的地方，而是与自己信仰相近并以大公集权为特点的新型政体等，这种认识甚至影响至今。

在东亚地区，葡萄牙海军首次到达中国广东沿海地区，与主导朝贡体系的明王朝文官政府相遇，甚至爆发海战，这一初步的接触虽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，但异质文明的碰撞本身，却对欧洲人的世界观带来了一定冲击，东方已经不再是马可·波罗口中财富的隐喻。

作者安排这些内容，并非要对1517年的历史进行编年体式的概述，而是力图从多个历史横剖面切入，阐释宗教改革之外同一年中发生的其他事件背后的时代意蕴。至从串联起“奇迹之年”内发生事件的主线，则是人类理性彰显的深层命题。这里的“理性”显然是“调和”的，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语境下权力话语的色彩，但正是这种“调和”，才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。在《1517：全球视野下的“奇迹之年”》中，“理性时代”的来临也不再是欧洲或者说西欧若干大国的“原

创”，而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频繁互动的结果。

其实，国内外关于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，但是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、现代早期欧洲史专家海因茨·席林教授所著的《1517：全球视野下

乡音

□梁毅兰

我读小学时，每年五月上旬，学校都会放一周“荔枝假”，让孩子们帮忙“抢收”荔枝。

我记得第一次跟父母摘荔枝时，天空正下着绵绵小雨，荔枝树浑身湿透，叶子还在往下滴水。父亲和母亲绕着一棵棵荔枝树转，或弯腰，或蹲脚，或爬树——要摘下果子自然要与荔枝树亲密接触，而雨水因为父母的接触，从树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，很快，我们都浑身湿透。

父亲是摘荔枝的主力，高处的荔枝需要他站在梯子上上去摘。只见他将人字梯打开，摆在荔枝树旁，开始往上爬。母亲站在梯子边，一手扶着梯子，一手提着小篮子。父亲目光巡视着，看到又红又多的一串荔枝，便用一只手捧着，另一只手开始小心翼翼地将这串荔枝翻转着，检查一面是否够红。如果够红，父亲就会用专门留了长指甲的拇指和食指小心地将它折下来，轻轻地放在母亲的小篮子里；如果还不够红，他就会轻轻放手，让它们继续生长。

我是个勤快的小帮手，一直站在父母身边递篮子，递铁钩。父亲将荔枝放到小篮子里后，一看差不多装满了，我就赶紧从母亲手里接过篮子，将荔枝转移到大箩筐里。有时，我还会帮助父亲将高处的荔枝用铁钩钩下来，让母亲去摘。

那时候，荔枝的集中收购点在隔壁镇。父亲要用大箩筐装着荔枝架在自行车后座，一个人骑自行车去隔壁镇卖荔枝。我上六年级时，已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母亲有时也会装一小箩筐荔枝，绑在我的小自行车架上，让我和父亲一起去卖。

那天刚好是我的农历生日。清晨，雨丝仍飘满天。我和父亲已骑着自行车出发了。路不好走，又下着小雨，小路很泥泞。正逢荔枝季，往来的车辆也很多。我紧跟在

我们捧着蛋糕回到家时，母亲正焦急着呢。因为同去卖荔枝的邻居都回来了，她担心我们在路上遇上意外，也担心荔枝不好卖。当我停好自行车，从箩筐里拿出蛋糕，献宝似的给母亲看时，父亲也凑过来，咧着嘴巴说：“孩子今天生日，我和她去买蛋糕了。”母亲并没怪我们，也笑着说：“没出事就好。我们一起吃蛋糕吧……”那个生日，真是让我难忘啊。

那些年，学校年年都会放“荔枝假”。大人们在辛苦地抢摘荔枝，孩子自然也没能闲着，但我们总是忙碌又喜悦的，因为那是收获的季节。